

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 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 集部國朝〈提要〉^{*}

曾守正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從清代官方纂修《四庫全書》起，《四庫全書》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的焦點。近年來包括《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四庫提要分纂稿》、《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提要》、《四庫全書總目》等大套相關叢書陸續翻印，近代學術中的「四庫學」，已走過時代的暗流，逐漸匯聚為一股重要的研究趨勢。

《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館編纂資料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圖書學史、目錄學史、文化史上，都產生至為深遠的影響。就學術史而言，這部書曾被學者形容為「《別錄》以來，始有此書」，也曾被看作「愚天下人之書」，頗具爭議。《四庫全書總目》自四庫開館迄於全書纂成，歷經二十餘年，問世歷程曲折，所

* 本文承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100-2628-H-004-087-MY3）補助，初稿宣讀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03.31），與會學者曾惠賜卓見；論文修改後，經學報匿名審查，復據寶貴之審查意見修訂完成。謹此向補助機關、與會學者、審查委員致謝。

以通過不同提要的比對，應可考察《總目》思想的凝結過程，並凸顯官方定論的意義。本文就《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清代書籍提要進行比對，發現兩者具有：魏禧地位的淡化、王士禛效應的深化、批判明代文學的力道漸強、對於南朝文學逐步肯定等現象。

關鍵詞：四庫學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

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 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 集部國朝〈提要〉

曾守正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清乾隆 37 年（1772）正月，高宗（1711-1799）下詔採訪遺書，翌年 2 月，依朱筠所提條例，綴輯《永樂大典》散篇以成部帙，並且開館編修《四庫全書》。^❶此後的 240 餘年，這部官修叢書引起不少的爭議，或以爲是讀書的門徑，或認爲是愚天下之書^❷，但這些岐見都無礙「四庫學」的形成。^❸在圖書史、目錄史、文化史上，《四庫全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學者無論自文獻檔案、目錄版本或學術孳衍的角度進行研究，已累積爲數不少的成果，逐漸匯聚爲重要的研究領域。

-
- ❶ 關於四庫開館的時間，有乾隆 38 年 2 月與閏 3 月兩種說法，參見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25-32。
- ❷ 分別見（清）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8 月），卷 204，語文 1「讀書宜有門徑」條，頁 3766；孟森：〈選刻四庫全書評議〉，見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4 月），頁 682-685。
- ❸ 據周積明教授考察，「四庫學」一詞約起於 1980 年代初期，見氏著：〈「四庫學」：歷史與思考〉，《清史研究》第 3 期（2000 年 8 月），頁 50-62。

《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館編纂的資料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大致分爲兩種研究進路^④：其一爲文獻考據取向，其包括《總目》內容的辨證、補撰、刊誤、續修，胡玉縉（1859-194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1884-1955）《四庫提要辨證》等人可爲代表。^⑤2012年魏小虎更蒐羅六百餘位學者的考訂資料，完成《四庫全書總目匯訂》^⑥，此亦反映《總目》自成書以來的某種學術傳統。其二爲文獻詮釋取向，包括自思想、史學、文學諸視域出發，詮釋《總目》所隱含的觀念，或考察《總目》編纂的歷程，錢穆（1895-1990）在1935年發表的〈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乃從學術史角度予以討論，可謂先聲；後起的楊家駱（1912-1991）在1946年發表的《四庫全書學典》，則從東、西學典的知識架構與內容，總述《四庫全書》的相關問題，皆屬此類。^⑦至於《總目》編纂歷程研究，黃愛平（1955-）、司馬朝軍的成果頗爲豐碩。^⑧整

④ 近年觀察《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現象的論著頗多，諸作中以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10月）一書最爲詳盡，值得參考，本文僅做概括說明。另可參見汪受寬、劉鳳強〈《四庫全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2005年3月），頁62-66；陳東輝：〈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頁29-38。

⑤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收入楊家駱：《四庫大辭典附四庫提要補證》（臺北：中國辭典館復館籌備處，1967年4月）、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980以後重要著作則有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10月）、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月）、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等書。此外，日本學者近藤光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唐詩集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84年10月）；笈文生、野村鮎子：《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2月）、《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2月）、《四庫提要宋代總集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1月）等著作，俱見語譯、注釋、版本考察。

⑥ 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匯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⑦ 楊家駱的四庫學貢獻，請參閱胡楚生：〈楊家駱教授對於「四庫學」的貢獻〉，收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8年9月），頁375-391。

⑧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四庫全書總目》研究》

體說來，第二種研究取向至 1980 後方見轉盛，其中周積明（1949-）在 1991 年出版的《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⁹一書，具有突破性與影響力。

事實上，近年隨著文獻資料的整理與出版，上述研究亦有合流的狀況，尤其分纂稿、稿本、書前〈提要〉的整理出版，使得官方意見的凝結過程與特色更為明晰。崔富章（1941-）曾指出「四庫學」中各種〈提要〉的情形：

世人熟知《四庫全書總目》內包含有一萬餘種圖書的〈提要〉，往往由此而忽略《總目》之外許多種圖書〈提要〉的存在。例如：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間輯印《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二十六種（刻印本四種，木活字牌印一百二十二種，後來續增十二種，總計一百三十八種），每種圖書卷前載有〈提要〉一篇；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三年歲末選輯《四庫全書薈要》四百六十三種，每種圖書前亦載〈提要〉一篇；乾隆四十七年繕寫完成文淵閣《四庫全書》三千五百十二種（此據《續宮史》所載〈欽定文淵閣《四庫全書》目錄〉統計，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三千四百四十八種，浙本《總目》著錄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廣雅書局刊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著錄三千四百七十種），除個別數種外，每種圖書卷前皆載有〈提要〉；乾隆四十八年後陸續完成的文源、文津、文溯、文宗、文匯、文瀾等六閣《四庫全書》亦都載有〈提要〉；還有別集傳世的邵晉涵、翁方綱、姚鼐、戴震、周永年、任大椿等纂修關的《四庫提要》分纂稿等等。獨立於《總目》之外存在的這許多〈提要〉傳本，相互之間差異甚大。¹⁰

所以，研究者若能勾稽細究各種〈提要〉，則可以廓清《四庫全書總目》的發展歷程。在臺灣的相關出版品中，2012年影印發行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以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2月）。

⁹ 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10月）。

¹⁰ 崔富章：〈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36卷第1期（2002年06月），頁1-19。

下稱《初次進呈存目》)¹¹，應是最值得注意的。《初次進呈存目》為國家圖書館所典藏，不分卷，清乾隆間鈔本，線裝 48 冊，共有 1871 篇〈提要〉：經部 9 冊 361 篇，史部 11 冊 426 篇，子部 12 冊 464 篇，集部 16 冊 620 篇。¹²1964 年北京中華書局整理《總目》合校本時，統計《四庫全書》著錄書有 3,461 種，存目書有 6,793 種，以每書籍一篇〈提要〉計算，應有 10,254 篇。¹³且將兩書相較，《初次進呈存目》僅佔《四庫全書總目》的 1/5 弱。

《初次進呈存目》的編纂時間為何？夏長樸（1947-）曾透過《初次進呈存目》與殿本、浙本《四庫全書總目》交互對照，包括對於嘉慶皇帝避諱的情形、圖書的著錄與分類，以及李清（1602-1683）、周亮工（1612-1672）等人違礙著作的處理與否，而推論《初次進呈存目》早於《四庫全書總目》（就乾隆 52 年 3 月令抽燬李清等人著作而言，《初次進呈存目》應早於此時）。次而將《初次進呈存目》與北四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簡目》相互比較，包括書籍的門目與分類、《初次進呈存目》收錄卻未見於閣本、《薈要》、《簡目》收錄、《初次進呈存目》有一書二〈提要〉的現象等，推論《初次進呈存目》早於《薈要》等書。最後，依據乾隆 39 年 7 月 25 日軍機處上諭檔案記載，包含《四庫全書》的編輯原則、〈提要〉撰寫的內容，加上《初次進呈存目》出現「侍讀紀昀家藏本」、「庶吉士汪如藻家藏本」等字樣¹⁴，綜合得出《初次進呈存目》彙集成編的時間應為：乾隆 40 年 5 月至 41 年正月之間。¹⁵

夏教授的推測頗具合理性，事實上，在《初次進呈存目》中，王士禎

¹¹ 方鵬程、俞小明總編輯：《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家圖書館，2012 年 12 月）。

¹² 同前註，經部〈凡例〉，頁 1。

¹³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11 月），「出版說明」，頁 3。

¹⁴ 紀昀任翰林院侍讀的時間為乾隆 38 年 8 月至 41 年 1 月，汪如藻任庶吉士時間為乾隆 40 年 5 月至 43 年 2 月。

¹⁵ 夏長樸：〈《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初探——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65-198。

(1634-1711) 姓名作「王士正」。乾隆 39 年 12 月 3 日曾下令：

原任刑部尚書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廟諱而改。但所改「正」字與原名字音太不相近，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能復知為何人。所有王士正之名著，改為王士禎。凡各館書籍記載，俱一體照改。欽此。¹⁶

這段文字的說法，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古懽錄》提要〉亦提及：

士禎原名下一字與世宗憲皇帝廟諱相同，故傳刻其書者皆改為士正，乾隆丁酉奉諭旨追賜今名。¹⁷

又《居易錄》（文淵閣本）書前〈提要〉云：

原名下一字犯世宗憲皇帝廟諱，刊本多改書為正，乾隆四十年奉旨以禎字代之。¹⁸

「丁酉」年為乾隆 42 年，我們綜上可知，從乾隆 39 年下令改名後，四庫館則陸續修改王士禎的名字。閣本著錄書容或未改，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總目》等〈提要〉皆將「士正」改作「士禎」¹⁹，而《初

¹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7 月），軍機處上諭檔，〈諭內閣所有王士正之名著改為王士禎各館書籍一體照改〉，頁 302。

¹⁷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 2 月），卷 63、史部 19、傳記類存目 5、〈古懽錄提要〉，頁 2（冊）— 387-388。又，後文所引〈提要〉，率以本註商務版殿本《總目》為研究底本；原書頁碼標記為「冊數—頁數」，今維持原貌並於前項末加（冊），以便閱覽。

¹⁸ 《居易錄》，子部 10、雜家類 3，文淵閣本〈提要〉末題識時間為「乾隆四十五年十月」。

¹⁹ 在四庫著錄書的內容中，則未必一一改正，如文淵閣《御選唐宋詩醇》、《皇朝通志》等等 10 餘種書籍。

次進呈存目》卻保持原樣，就此可知〈提要〉纂寫時間較早，甚至在四庫開館不久後即書寫，但彙集書稿的時間則可能為乾隆 40 至 41 年。

本文旨在探討《四庫全書總目》文學觀念的凝聚過程，以《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裏清人著作的〈提要〉為材料，即藉著清朝（館臣）人述評清朝著作為觀察對象，闡論《四庫全書總目》觀念定型的情形，而為顯明清人評清著之意，故將此類〈提要〉題名為「國朝〈提要〉」。至於與《四庫全書總目》相互參照的文獻，則為《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準此，《四庫全書總目》卷 148、集部 1、楚辭類收有國朝著錄書 2 種和存目類 11 種，卷 173、集部 26、別集類 26 收有國朝著錄書 42 種，卷 181 至 185 別集類國朝存目書 578 種，卷 190 總集類著錄書 30 種，卷 194 總集類存目書 100 種，卷 196 詩文評類著錄書 9 種，卷 197 國朝詩文評類存目書 16 種，卷 199 國朝詞曲類著錄書 9 種，卷 200 國朝詞曲類存目書 21 種，合計 818 種。《初次進呈存目》國朝書〈提要〉計有：別集類 69 篇、奏議類 4 篇、總集類 15 篇、詩文評類 2 篇、詞曲類 5 篇，合計 95 篇。《初次進呈存目》與《四庫全書總目》所收數量雖相差 8.5 倍，可是有幾個現象仍值得注意：「魏禧家族文學地位淡化及其文集撤出」、「王士禛效應的擴大與評議」與「自國朝追溯於前朝文學現象」。

二、魏禧家族文學地位之淡化及其文集之撤出

（一）文學地位之淡化

《初次進呈存目》中有 4 部魏氏書籍未納入《四庫全書總目》：

《魏叔子集三十三卷》

國朝魏禧撰。禧字冰叔，寧都三魏之一也。禧兄弟皆傳姚江之學，以經濟為務。禧文尤縱橫奧衍，不名一格，而大致近乎蘇洵、蘇軾。國初稱古文者，首推焉。其集文二十二卷，分十八體，體各冠以題詞；詩八卷，非所

擅長；日錄三卷，中多精確之論，切乎寔用，亦非諸家語錄空談性命者比。²⁰

《耕廬文稿十卷》

國朝魏世倣撰。世倣字昭士，寧都魏禮之子。文亦有家法。其伯父禧為之序，稱其性稍急，勇于事，文亦肖之，特少展拓。²¹

《魏興士文集六卷》

國朝魏世傑撰。世傑寧都人，際瑞子，興士其字也，從叔禧學古文。以父為山賊韓大任所害，哀痛自斃，卒。其集，文五卷，詩一卷，大抵與禧文相近而功力未逮。²²

《魏季子文集十六卷》

國朝魏禮撰。禮字和公，禧之弟也，故曰季子。凡為詩六卷，文十卷，禧為之序謂其文近柳子厚，然鱸韞未至，未得與禧肩隨。合其子世倣、世儼集，又名《季子三家集》。²³

明末清初江西寧都三魏兄弟祥（改名際瑞，1620-1677）、禧（1624-1681）、禮（1628-1693）及子姪輩世倣（1645-1677）、世傑（1655-1725）等人，曾和友人於翠微峰上築「易堂」而居。《初次進呈存目》尚存與魏氏家族相關書籍的〈提要〉4篇，自〈提要〉可以發現是以魏禧為核心人物，一方面敘說魏禧為國初古文的「首推」者，其文風「縱橫奧衍」，雖不名一格，但近似蘇洵、蘇轍；另一方面則繼承姚江之學，以經濟為務，不空談性命。²⁴簡短的〈提要〉文字，實已鉤勒魏禧的學問源流與特色，並且顯明他的地位。準此，在其弟魏禮、其姪世倣、世傑的別集〈提要〉裏，也顯現魏禧對於他們的影響。《初次進呈存目》在〈堯峯

²⁰ 同註11，集部，頁901。

²¹ 同前註，頁915。

²² 同前註，頁961。

²³ 同前註，頁963。

²⁴ 關於魏禧與「易堂」諸子的學術特色，可參見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附錄一」〈易堂三論〉，頁385-453。

文鈔五十卷》中，再次提及魏禧的地位：

國朝汪琬撰。琬字茗文，號鈍翁，晚居堯峯，因以自號，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戶部主事陞刑部郎中，降補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陞戶部主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初裒其文為《鈍翁類藁》，一名《汪氏傳家集》，晚年手自刪汰，定為此編。國初稱古文者，推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及琬三人，禧學近縱橫，朝宗體兼華藻，惟琬經術湛深，言有根柢，尤為當代所重焉。²⁵

相對於將魏禧為古文「首推」者的說法，這段文獻則是尊崇汪琬（1624-1691），而其判準在於汪琬的「經術湛深，言有根柢」。這樣的說來，對於清初古文三大家的地位高低次序，出現前後說法不一的矛盾現象，此應出於〈提要〉非一人所作而然。

《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四庫全書總目》相同，魏氏四書未見載錄。又魏禧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共有 18 處提及之，其中與文學相關的描述，較為顯著的有：

《左傳評三卷》

國朝李文淵撰……《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²⁶

《遂初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國朝潘耒撰……其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古文蹊徑較平，稍遜於魏禧諸人，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則又耒所獨得也。耒家吳江之爛溪，少受業於顧炎武，頗得其傳，故詩文皆有原本，特其議論之文，皆反覆求快；太

²⁵ 同註 11，集部，頁 1009。

²⁶ 同註 17，卷 31、經部 31、春秋類類存目 2，頁 1（冊）— 643。

傷於盡，未免失之好辯焉。²⁷

《墨澗亭集》

國朝帥我撰……江西古文自艾南英倡於前，魏禧等和於後，踵而起者雖所造深淺不同，而大都循循有舊法，是集亦其一也。²⁸

《瑞竹亭合藁》

國朝王愈擴及其弟王愈融撰……兄弟俱從魏禧遊，愈擴文長於論古，頗能曲折如志，蓋其師授如是也。愈融筆力稍弱，風骨尚未老成，較亞於其兄。²⁹

從這幾段文獻看來，《四庫全書總目》自師承源流與參對比照的角度，描述魏禧古文的影響與特色，但從「艾南英倡於前，魏禧等和於後」一句可以得知，《四庫全書總目》不若《初次進呈存目》來得尊顯魏禧。

若以《堯峰文鈔五十卷》〈提要〉為觀察點，更可以發現〈提要〉的轉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

國朝汪琬撰。琬與魏禧、侯方域並以古文擅名，宋荦嘗合刻之。然方域才人之文，禧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經典不失為儒者之文。歐、蘇、曾、王，固未易擬，以接跡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等，無愧色也。³⁰

《四庫全書總目》云：

國朝汪琬撰……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

²⁷ 同前註，卷 183、集部 36、別集類存目 10，頁 4（冊）— 901。

²⁸ 同前註，卷 184、集部 37、別集類存目 11，頁 4（冊）— 927。

²⁹ 同前註，卷 194、集部 47、別集類存目 4，頁 5（冊）— 200。

³⁰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世界書局，1975 年 11 月），卷 18、集部 7、別集類 6，頁 819。

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徑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³¹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尚且保留汪琬、魏禧、侯方域（1618-1654）並稱的說法，同時予以探源，將汪琬接跡於明代唐宋派大家王慎中（1509-1595）、唐順之（1507-1560）、歸有光（1507-1571）等人。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則抹去汪、魏、侯三家並稱的說法，僅留下汪琬接跡唐、歸的敘述。這個轉變也足見《四庫全書總目》在形成的過程中，配合帝王意志與編纂方針，做了部分調整。

（二）魏氏文集之撤出

在纂修《四庫全書》的檔案中，有幾則關於魏氏家族文集的查禁狀況。乾隆47年4月30日，閩浙總督陳輝祖（?-1783）查禁奏繳49種禁書，其中即有魏氏著作：

《寧都三魏集》七部，刊本。是書魏際瑞等著。際瑞與叔弟禧、季弟禮號稱三魏。是集皆其兄弟所作詩文，凡序傳誌銘論策中，皆多違礙。一部全、六部不全。³²

乾隆47年10月7日，魏氏文集又列為湖北省巡撫姚成烈（1716-1786）所奏第11次查繳應禁之書。該書係因「准各省咨查禁書」之其一：

³¹ 同註17，卷173、集部26、別集類26，頁4（冊）—585-586。又，文溯閣本書前〈提要〉則介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四庫全書總目》之間，即於《四庫全書總目》「琬學術既深」句前有「而琬與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為最工。宋華嘗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學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浮夸。」此〈提要〉末題時為乾隆47年7月，見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11月），頁930。

³² 〈閩浙總督陳輝祖奏角應禁書籍摺（附清單一）〉，同註16，頁1527。

《魏氏全集》一部，刊本。係魏禧著。計四十本，全。³³

查禁魏氏文集的動作，在往後幾年仍然持續進行，如安徽巡撫書麟（?-1801）所奏繳交應禁書籍即是其例，乾隆 51 年 4 月 13 日：

安徽巡撫臣書麟跪奏，為查繳應禁各書，仰祈睿鑒事。竊照明末野史暨國初人所著悖妄各書，節蒙聖訓，實力搜查，經前任各撫臣陸續查繳，並先後奏請展限搜羅。臣因上年展限屆滿，誠恐江南書籍繁多，查繳未能淨盡，複恭折奏請展限一年在案……臣仍嚴飭各屬實力搜查並剴切出示曉諭，此次不行呈繳，日後查出，即幹重咎，凡有稍涉悖妄各書，俱令及時呈繳，以淨根株。³⁴

《魏叔子集》一本，不全。明魏禧著。³⁵

書麟力查江南「悖妄各書」，且呈請展延搜羅期限，俾利「以淨根株」。乾隆 55 年 5 月 7 日，浙江巡撫覺羅琅玕（?-1802）查繳違礙書籍：

浙江巡撫臣覺羅琅玕跪奏，為查繳應禁違礙書籍，恭折具奏事。竊照浙江省查繳應禁各書，經前撫臣先後繳過共二十四次。嗣又接奉諭旨，飭再收繳，祇須查銷淨盡，毋庸定以限期。欽此。欽遵。當經臣嚴飭所屬，查出應禁之《檀園集》等書二十種、《今是堂》等集二十六種、《明政統宗》等書一百四十六種，於乾隆五十三、四兩年三次奏明解京銷毀在案。臣仍謹遵諭旨實力督查，並移會學政臣寶光鼎督同教職等不動聲色，勸諭收繳。茲據布政使顧學潮詳稱：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四月止，據各州

³³ 〈湖北巡撫姚成烈奏解第十一次查繳應禁各書並繕單呈覽摺（附清單一）〉，同前註，頁 1655。

³⁴ 〈安徽巡撫書麟奏繳應禁書籍並懇再予展限一年摺（附清單一）〉，同前註，頁 1934-1935。

³⁵ 同前註，頁 1936。

縣學陸續繳到應禁各書共二百七十一種，計四千八本存貯書局，匯請具奏前來。臣複將現繳各書名目逐一查對，俱系軍機處、四庫館行知暨各省、本省從前節次奏繳，均屬應營銷毀之書。³⁶

《三魏文集》五十五本。魏際瑞、魏禧、魏禮撰。³⁷

查禁違礙圖書時間之長久與狀況之劇烈，在上述檔案曉然可見。總之，透過《初次進呈書目》的記錄，我們可以得到朗廓的歷史樣貌：《四庫全書總目》在形成的過程中，魏禧地位隨著國家政策由升而降。

三、王士禛效應的擴大與評議

《四庫全書總目》存在著王士禛現象³⁸，即其屢屢引述、討論甚或評價王士禛的言論。在《初次進呈存目》與《四庫全書總目》的比對中，更可以發現此種現象，是逐步加深的。在《初次進呈存目》集部國朝〈提要〉中，涉及王士禛者計有 19 篇，其中或為王士禛之著作《精華錄》、《古詩選》³⁹，或為王氏兄弟如王士祿（1626-1673）《十笏草堂詩選》，或士禛曾為作序者如孫蕙（?-?，1681 在世）《笠山詩選》、陶孚尹（?-?，1675 在世）《欣然堂集》，在這些狀況下提及王士禛，應屬自然，但還是有在其他〈提要〉特別引述王士禛的見解，甚至表達對其見解的評議，這些都更值得注意。

田雯（1635-1704）《古懽堂集》〈提要〉即為一例，《初次進呈存目》、《四庫全書總目》依序云：

³⁶ 同前註。

³⁷ 〈浙江巡撫琅玕奏查繳違礙書籍情形摺（附清單一）〉，同前註，頁 2184。

³⁸ 參見楊晉龍：〈王士禛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地位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 7 期（1993 年 5 月），頁 2-6；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 9 月），第四章〈祖宋與神韻〉，頁 174-266。

³⁹ 《初次進呈存目》與《四庫全書總目》於集部收錄王士禛之著作，計有《精華錄》與《古詩選》2 種，但《初次進呈存目》的〈《古詩選》提要〉為殘稿，故本文暫不予討論。

國朝田雯撰。雯字子論，一字綸霞，號山蘊子，德州人……順治、康熙之間，宋派初微，唐音競作，王士禛之清新，朱彝尊之博雅，均擅價一時，雯欲以奇麗駕其上，故其詩文皆組織繁富，鍛鍊刻苦，不肯規規作常語。⁴⁰

國朝田雯撰。雯字子綸，一字綸霞，號山蘊，德州人。……當康熙中年，王士禛負海內重名，文士無不依附門牆，求假借其餘論。惟雯與任邱、龐塏不相辨難，亦不相結納。塏《叢碧山房集》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雯則天姿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奐之氣，欲以奇麗駕士禛上，故詩文皆組織繁富，鍛鍊刻苦，不肯規規作常語。趙執信作《談龍錄》，嘗議其詩中無人。然偏師馳突，終能自成一隊，談藝者弗能廢也。⁴¹

《初次進呈存目》指出當宋詩派式微之時，主張學習唐音的詩派競逐而出，其中王士禛的「清新」與朱彝尊（1629-1709）的「博雅」各擅場域。但《四庫全書總目》則專主於王士禛，指王氏「負海內重名」，無形中消滅了朱彝尊的重要性。不僅於此，《四庫全書總目》進而引述《談龍錄》對田雯詩的批評——「詩中無人」，有趣的是，趙執信（1662-1744）也運用這個批評用語，抨擊王士禛詩學。館臣雖認為田雯終能異於神韻派，「偏師突馳，自成一隊」，但館臣聚焦於王士禛的評述方法，仍值得關注。

就王士禛著作〈精華錄提要〉而言，同樣可見兩種〈提要〉的差別。《初次進呈存目》、《四庫全書總目》分別說：

國朝王士禛撰。其門人曹禾、盛符升所編輯也。其子啟汧跋曰：「宋任淵嘗摘黃魯直詩為《精華錄》，盛侍御、曹祭酒題先生詩曰《精華錄》，蓋以魯直比先生，而自附于淵也。」士禛後復自編《帶經堂集》，然其平生

⁴⁰ 同註11，集部，頁937。

⁴¹ 同註17，卷173、集部26、別集類26，頁4（冊）—595-596。又文溯閣本書前〈提要〉則介於《初次進呈存目》與《四庫全書總目》之間，仍保有「王士禛之清新，朱彝尊之博雅」，同註31，頁934。

佳製，此書已括其大凡，不必以多為貴也。是集初有金榮箋注，後惠棟復為之訓纂。⁴²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懽錄》，已著錄。其誌初刻有《落牋堂集》，皆少作也。又有《阮亭詩》及《過江》、《入吳》、《白門》前後諸集，後刪併為《漁洋前集》，而諸集皆佚。嗣有《漁洋續集》、《蠶尾集》續集後集、《南海集》、《雍益集》諸刻。是編又刪掇諸集合為一帙。相傳士禎所手定，其子啟汧跋語，稱「門人曹禾、盛符升，仿任淵《山谷精華錄》之例，鈔為此錄」者，蓋託詞也。士禎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為宗。其在揚州作〈論詩絕句〉三十首，前二十八首皆品藻古人，末二首為士禎自述。其一曰：「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艸峽，冷雁哀猿和竹枝」。平生大指具在是矣。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說，如《聊齋志異》之類，士禎偶批數語於行間，亦大書「王阮亭先生鑒定」一行，弁於卷首，刊諸梨棗以為榮。惟吳喬竊目為「清秀李于鱗」（見《談龍錄》），汪琬亦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見士禎自作《居易錄》）。而趙執信作《談龍錄》，排詆尤甚。平心而論，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縛豔，流為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郎，上及乎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故國朝之有士禎，亦如宋有蘇軾，元有虞集，明有高啟。而尊之者必躋諸古人之上，激而反脅，異論遂漸生焉。此傳其說者之過，非士禎之過也。是錄具存，其造詣淺深可以覆按。一切黨同伐

42 同註 11，集部，頁 911。

異之見，置之不議可矣。⁴³

對照這兩段文字，應可充分顯現《四庫全書總目》對於王士禛的重視與評價。《初次進呈存目》旨在說明《精華錄》成書的由來，該書的重要性以及後來的箋註訓纂的情形。換個角度說，《初次進呈存目》對於王世禛個人及其文學表現，未有整體介紹與評估。反觀《四庫全書總目》，先述王士禛諸種著作併合存逸的狀況，然後認為《精華錄》為王士禛手定而成，王啓沂（?-?）〈跋〉語為託詞（此不同於《初次進呈存目》的見解）。最特別的是，《四庫全書總目》又增添 500 餘字，大談王士禛詩學淵源（「源出嚴羽」）、特色（「以神韻為宗」）、對於清初文壇的影響，以及吳喬、汪琬、趙執信等人的批評，最後轉從詩史發展的角度，闡明王士禛的詩學價值。

在這 500 餘字的論述裏，館臣有理有證，如以王士禛的《論詩絕句》「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舸峽，冷雁哀猿和竹枝」，作為他自己平生主張之大旨所在。在此沒有多餘的推論過程，只讓讀者自行推想：雁猿淒冷悲傷的鳴叫聲，伴和里社之間的〈竹枝〉歌詞，使三閭大夫哀怨之情，自然地繚盪在空舸峽之間，此種不必主角出場，夫子自道，卻能使情愫在景物之間緩緩流洩的作法，即是「神韻」的表現特色。又館臣謂時人的詩集、小說，往往託名士禛的點評、鑑定，即可抬高身價，以顯示王士禛的影響力。最後，館臣藉汪琬等人的批評，再將焦點逐漸聚於王士禛身上。

接著，館臣分別探討神韻派的發生意義與理論意義。所謂的「發生意義」，是指神韻派在線性歷史力量的催促下，展開自我主張，而時間的起點就從明代中葉開始：明代七子王世貞（1526-1590）、李攀龍（1514-1570）等人，因復古而剽竊，因剽竊而「膚廓」；竟陵派詩人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7）為修正「膚廓」之弊，而走入纖巧險仄的地域。清初為了避免孤深幽峭，轉而學習宋、元詩歌。但宋詩風格「質直」，學者之作流於「有韻之語錄」；元詩風格「縹緲」，習者之作則成「對句之小詞」，這氛圍便蘊發王士禛的主張。至於「理論

⁴³ 同註 17，卷 173、集部 26、別集類 26，頁 4（冊）— 584-585。

意義」，館臣乃指「神韻」派的特點為「範山模水，批風抹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古體作品與《古詩十九首》之「驚心動魄」，其近體作品與杜甫（712-770）之「忠厚纏綿、沉鬱頓挫」，判若鴻溝。正因神韻派有此鮮明的個性，所以擁護的徒眾與反對的人就容易形成對抗。從上述的描述，足見館臣具有關注王士禛的特殊立場。整體說來，此處對於王士禛詩學，多予正面肯定，但這就意味館臣以神韻為詩學之宗主嗎？

王士禛與趙執信的確曾有嚴重的路線爭執，《初次進呈存目》說⁴⁴：

《飴山詩集》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官右贊善。同時新城王士正以詩負盛名，學之者惟趨神韻。執信後起獨持異同之論，其說見于所撰《談龍錄》中，大旨主於詩中有人，彼此不可移掇，故其詩刻摯有餘，而邊幅稍狹，所著有《并門》、《閑齋》、《還山》、《觀海》等集十四種，茲彙為一帙，通十九卷，末附詩餘一卷。⁴⁵

《談龍錄》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為王士正甥婿，初甚相得，後以求作《觀海集》序不得，遂致相失。因士正與門人論詩，謂當作雲中之龍，時露一麟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大旨謂詩之中當有人在。其謂士正〈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為類羈臣遷客之詞。又述吳修齡語，謂士正為清秀李于鱗。雖忿悞著書，持論不無過激；然神韻之說，不善學者易流于浮響，施閏章「華嚴樓閣」之喻，

⁴⁴ 《初次進呈存目》涉及王、趙之爭的〈提要〉，除了正文所列3篇之外，尚有：田雯《古懽集》下：「王士正《池北偶談》嘗記其好奇，而趙執信作《談龍錄》亦議其詩中無人，然才學富贍，排纂縱橫，雖不諧於中聲，亦岸然自異之士也」，頁973。馮廷樞《馮舍人遺詩》下：「王士正序之稱其天才超逸，多頓挫悲壯之詞。是集為趙執信所編，《凡京集》三卷、《晴川集》一卷、《雪林集》一卷、《曹村集》一卷，前有執信序，謂士正知之不盡。明恩怨之詞也。」頁983。此二〈提要〉內容與《總目》類近，本文暫不討論。

⁴⁵ 同註11，集部，頁969。

汪琬「西川錦匠」之戒，士正亦嘗自記之，則執信此書，亦未始非預防流弊之切論也。⁴⁶

《聲調譜》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字仲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官右贊善。執信嘗問聲調於王士禛，士禛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因著為此書。⁴⁷

上述三則〈提要〉皆涉及王、趙之爭，相對於王士禛「當作雲中之龍，時露一麟一爪」之說，趙執信主張的「詩中有人」，在館臣看來，卻是「持論不無過激」，唯可諒解的是，趙說「未始非預防流弊之切論」。此外，館臣指出趙氏「其詩刻摯有餘，而邊幅稍狹」，但對王士禛的詩作，反倒未有負面評價；至於神韻派所產生的流弊，又僅限縮在不善於學習的跟隨者身上，而非王士禛本人。就此看來，《初次進呈存目》帶有王氏評價高於趙氏的傾向。

相應於《初次進呈存目》，《四庫全書總目》收有《談龍錄》、《聲調譜》，二部書目的內容大致相同，唯《四庫全書總目》〈談龍錄提要〉篇末增加「近時揚州刻此書，欲調停二家之說，遂舉錄中攻駁士禛之語，概為刪汰，於執信著書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今仍以原本著錄，而附論其紕繆如右。」⁴⁸此對於《談龍錄》揚州刻本略以說明外，並無文學觀念上的增減。至於《飴山詩集》，《四庫全書總目》則未收錄，但另收錄了《因園集》。

《因園集》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字仲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益都人……執信娶王士禛之甥女，初相契重，相傳以求作《觀海集》序，士禛屢失其期，遂漸相詬厲，讐隙終身。今觀《還山集》中尚有酬士禛詩二首，又為士禛作

⁴⁶ 同前註，集部，頁1287。

⁴⁷ 同前註，集部，頁1289。

⁴⁸ 同註17，卷196、集部49、詩文評類2，頁5（冊）—251-252。

〈西城別墅十三詠〉。至《鼓枻集》中〈渡江〉一首，已有「祇應羨詩老，持節問岷源」句，注曰：「謂阮翁」。又〈悼吳孝廉〉一首有「漁洋未識名先著」句，其詞氣已不和平，自是以還，遂互相排擊，則謂二人之釁，生於作《觀海集》時，其說當信。迨其後沿波逐流，遞相祖述，堅持門戶，入主出奴，嘵嘵然迄無定說。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為宗，趙以思路剗刻為主；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⁴⁹

這段話對於王、趙之爭，有了更深刻而具體的勾勒，譬如館臣自趙詩的內容，推敲兩人交惡的時間，又比較王、趙二家的詩風特色，謂分別為「縹緲」與「剗刻」，然後再帶引出「膚廓」與「纖小」的流弊。值得注意的是，館臣最終採取折衷的主張：兩家互救其短，以「各見所長」。至此，《四庫全書總目》已異於《初次進呈書目》中王氏高於趙氏的評價，也非《四庫全書總目·精華錄提要》的正面論述而已。⁵⁰

四、自國朝追溯於前朝文學現象

在國朝書〈提要〉中，所溯及之前朝主要有二，一為明代，一為南朝。⁵¹關於

⁴⁹ 同前註，卷 173、集部 26、別集類 26，頁 4（冊）— 597。

⁵⁰ 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俱見於《初次進呈書目》與《四庫全書總目》，而《四庫全書總目》另增一段評議：「其詩法傳自王士禎，而才氣縱橫，視士禎又為別格。趙執信《談龍錄》記嘗見其〈浯溪中興頌〉詩起句云『楊家姊妹顏妖狐』，即擲去不視。謂頌中興而自天寶致亂敘起，雖萬言不難辦也。雖以懋麟為新城弟子，借懋麟以攻士禎，未免操之已蹙。然亦足見其少所翦裁矣。」所涉亦屬王、趙之爭。又關於館臣對神韻說的意見，請參見曾守正：〈所見與不見——《四庫全書總目》視野下的《漁洋詩話》〉，收入賴貴三主編：《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秩壽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 年 3 月），頁 515-536。

⁵¹ 〈提要〉有另涉他朝者，唯其篇幅簡短或內容零散，故本文暫不予討論。

明代敘述，吳之振（1640-1717）《宋詩鈔》的〈提要〉云：

國朝吳之振編。之振字孟舉，石門人。以宋詩選本叢雜，因蒐羅遺集，共得百家。其本無專集及有集而所選不滿五首者，皆不錄。每集之首，繫以小傳，略如元好問《中州集》例，而其文加詳。然品題雖善而簡，擇乃不甚精，又刊刻未終，即摹印行世。其有錄無書者，凡劉弇、鄧肅、黃幹、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馮時行、岳珂、嚴羽、裘萬頃、謝枋得、呂定、鄭思肖、王柏、葛長庚、朱淑真十六家。⁵²

國朝吳之振編。之振有《黃葉村莊詩集》，已著錄。是編以宋詩選本叢雜，因蒐羅遺集，共得百家。其本無專集及有集而所選不滿五首者，皆不錄。每集之首，繫以小傳，略如元好問《中州集》例。而品評考證，其文加詳。蓋明季詩派，最為蕪雜。其初厭太倉、歷下之剽襲，一變而趨清新。其繼又厭公安、竟陵之纖佻，一變而趨真樸。故國初諸家，頗以出入宋詩，矯鉤棘塗飾之弊。之振是選，即成於是時。以其人自為集，故甫刊一帙，即摹印行世。所傳之本，往往多寡不同。此本有錄無書者，尚有劉弇、鄧肅、黃幹、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馮時行、岳珂、嚴羽、裘萬頃、謝枋得、呂定、鄭思肖、王柏、葛長庚、朱淑真十六家。蓋剞劂未竣，故竟無完帙也。近時曹廷棟病其未備，因又有《宋人百家詩存》之刻，以補其闕，皆之振之所未錄。然之振於遺集散佚之餘，初意蒐羅，使學者得見兩宋詩人之崖略，不可謂之無功。與廷棟之書互相補苴，相輔而行，固未可偏廢其一矣。⁵³

《初次進呈存目》敘述作者生平、宋詩選本的狀況、《宋詩鈔》的體例、《宋詩鈔》的得失；《四庫全書總目》保留前者的內容之外，又增加兩個元素：一為明代詩派延續至清初的發展狀況，二是清初宋詩的重要選本《宋人百家詩存》。值

⁵² 同註 11，集部，頁 1235。

⁵³ 同註 17，卷 190、集部 43、總集類 5，頁 5（冊）— 106。

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總目》對明末詩學的批評，甚為嚴厲，先以「最為蕪雜」總說之，然後逐步鋪陳明季詩史的起源與發展：由厭惡王世貞（江蘇太倉人）、李攀龍（山東歷城人）的「剽竊」開始，進而帶出公安、竟陵派的「趨新」；次而指公出安、竟陵派流於「纖佻」，所以又產生趨向「真樸」的主張，而宋詩派與《宋詩鈔》便蘊隆而生。

《四庫全書總目》如此溯源並且反身批評前代的作法，同樣見於〈堯峰文鈔提要〉。上文討論魏禧時，曾經徵引《堯峰文鈔》的三種〈提要〉，而《四庫全書總目》特別強調「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同樣強烈批評了七子與三袁。對於明代中葉以降的文學史發展，館臣始終抱著線性、退化的史觀，於此清晰可見。

對於前朝的回顧，《初次進呈存目》因載錄吳兆宜（?-?，1672 在世）的《徐孝穆集箋註》、《庾開府集箋註》，所以出現南北朝的著作，自然地，館臣也就順勢視發揮見解。《初次進呈存目》與《四書全書總目》涉及徐、庾二人的〈提要〉，亦有值得玩味之處：

陳徐陵撰。國朝吳兆宜箋註。陵字孝穆，東海郟人，梁太子左衛率嫡之子。八歲能屬文，既長博涉史籍，在梁世已以文章名。入陳後累官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諡曰章陵。為文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原集三十卷，今已久佚。此乃從人從《藝文類集》、《文苑英華》諸書採掇而成。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嘗注《玉臺新詠》、《庾信集》、《才調集》、《韓偓集》。及書此中有未及註者，其同里徐文炳補之。⁵⁴

陳徐陵撰。國朝吳兆宜註。《隋書·經籍志》載陵集本三十卷，久佚不傳。此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陳書》本傳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

⁵⁴ 同註 11，集部，頁 921。又，原書名誤作《考穆集》，本文更正之。

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其集舊無註釋，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箋之，未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為補緝，以成是編。其中可與史事相證者，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胡三省註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按集中〈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有云：「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為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特《通鑑》但書其本官，並非舛誤，胡三省未考陵書，未免曲為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訛。而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於摭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也。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並傳焉。⁵⁵

上述二〈提要〉都涉及徐陵（507-583）的文學表現以及吳兆宜箋註的得失。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更為詳盡。館臣藉胡三省（1230-1302）註《資治通鑑》的缺失，表顯自己考證的功力，檢討吳兆宜的不足外，還記述了徐陵的評價。

關於徐陵的地位，《初次進呈存目》言「八歲能屬文，既長博涉史籍，在梁世已以文章名」、「為文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四庫全書總目》則添增「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陳書》本傳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這兩部書目都未置嫌惡之詞。《四庫全書總目》徵引《陳書》的作法，應是出於肯定徐陵地位的表現。《陳書》是出身於南方的史學家姚思廉（557-637）所作，而《陳書》內容包含姚察（533-606）的舊稿，姚察為姚思廉之父，曾任陳朝祕書監等要職，因此，在初唐編修前代史的著作中，《梁書》、《陳書》就具有同情南朝政權的傾向。⁵⁶反觀北人魏徵（580-643）《隋書·文學傳·序》說：「梁自大同之

⁵⁵ 同註17，卷148、集部1、別集類1，頁4（冊）—23。又，《總目》變更該〈提要〉之部類次序。

⁵⁶ 唐初之此類傾向，參見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之異趣及其影響〉，收入氏著：《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6月），頁363-414。

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滛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⁵⁷就是另一種不友善的觀點。館臣在兩種不同的歷史觀點中，選擇南方觀點，這並非孤例。

《庾開府集箋註》

國朝吳江吳兆宜撰。庾信集久佚，今本雖冠以周滕王迥舊序，實從諸書中抄撮而成。其唐張廷芳等三家所注〈哀江南賦〉，今亦不傳。近胡渭始為作註，兆宜採輯其說，復與崑山徐樹穀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隋志》著錄者，今已十不存五。兆宜摭撫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所出。如註〈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索隱》誤本，以園公為姓庾，以四皓為漢相。其附會牽合，可以槩見矣。⁵⁸

周庾信撰。國朝吳兆宜註。信，《周書》有傳。然考集中〈辛成碑〉文，稱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則入隋幾一載矣。信為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敵先奔，厥後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為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斥為詞賦之罪人。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則斷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其推挹甚至。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

⁵⁷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0月)，冊6，卷76，列傳第41〈文學〉，頁1730。

⁵⁸ 同註11，集部，頁945。

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則諸家之論，甫固不以為然矣。《北史》本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迥之序合，《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倪瓚《清閟閣集》有《與彝齋學士書》曰：「聞執事新收得《庾子山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僕，不時也。茲專一力致左右，千萬暫借一觀」云云，則元末明初尚有重編之本，今亦未見。此本雖冠以滕王迥序，實由諸書鈔撮而成，非其原帙也。《隋書·魏澹傳》稱，廢太子勇命澹註《庾信集》，其書不傳。《唐志》載張廷芳等三家嘗注《哀江南賦》，《宋志》已不著錄。近代胡渭始為作註，而未及成帙。兆宜採輯其說，復與崑山徐樹穀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摭撫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所出。如注《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索隱》誤本，以園公為姓庾，以四皓為漢相，殊不免附會牽合。後錢塘倪璠別為箋註，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經營剏始之功，終不可沒。與倪注並錄存之，亦言杜詩者不盡廢千家注意也。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註徐、庾二集，又註《玉臺新詠》、《才調集》、《韓偓詩集》，今惟徐、庾二集刊板行世，餘惟鈔本僅存云。⁵⁹

此處為類近徐陵的例子，兩種〈提要〉都先敘述庾信（513-581）的生平與文學地位，然後描述庾信文集的流傳情形、吳兆宜箋註的得失。但《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字篇幅，又多《初次進呈存目》4倍餘，而對於庾信的文學表現，依然有更多的說明。《四庫全書總目》先徵引李延壽、王通、令狐德棻諸人的負面評價，然後嘗試為庾信辯護，謂前人之負評，只是針對宮體詩而發的，此不足概括庾信所有的文學表現。館臣認為，庾信入北之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反映於文學創作上，則「華實相扶，情文兼至」，進而引述張說（667-730）〈過庾信宅〉、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評論，其中的「筆涌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凌雲健筆意縱橫」之語，已遠非「淫麗」一類概念所能涵蓋的。因此，館臣對於南朝華麗的文學風格，有逐步體認並肯定的現象。

⁵⁹ 同註17，卷148、集部1、別集類1，頁4（冊）—21-22。

五、結語

《初次進呈書目》雖為殘稿，但通過上述的討論，我們依然可以掌握《四庫全書總目》觀念形成的幾個現象：

- 一、由於乾隆 47 年查禁魏禧及其族人的著作，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出現淡化魏氏文學地位的現象。
- 二、《四庫全書總目》較《初次進呈書目》更深化王士禛效應，無形中減低朱彝尊的地位，而讓神韻之清新取代宋詩之質直。
- 三、《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明代文學發展的批判力道逐漸增強，並且以線性、退化的史觀，構築明代文學積唐的走向，或藉以反身顯現清代文學足以超越明代文學的樂觀立場。另一方面，通過肯定庾信的文學特質與地位，展現對於文學「華麗」質素的容納態度。

此外，王汎森（1958-）曾以清代文字獄為起點，將國家政策滲入士大夫心理，甚而產生「自我壓抑」的現象，稱為「權力的毛細管作用」。⁶⁰承受這種毛細管作用最大的場域與個人，應該是四庫全書館以及館臣，本文所歸結的幾個現象，亦符合於王先生的詮說模型，只是在帝王的權力之下，作為個人的館臣如何保住自我的「表面張力」？又如何產生依附於帝王權力的「黏附力」、「內聚力」？就是值得再予深究了。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⁶⁰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4月），頁393-500。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世界書局，1975。

清·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方鵬程、俞小明總編輯，《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家圖書館，20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二、近人論著

1. 專著

王汎森 201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司馬朝軍 2004《《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司馬朝軍 2005《《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牟潤孫 1990《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余嘉錫 2004《四庫提要辨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李裕民 2005《四庫提要訂誤》，北京：中華書局。

周積明 2001《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孟森 2006《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北京：中華書局。

胡玉縉 196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收入楊家駱：《四庫大辭典附四庫提要補證》，臺北：中國辭典館復館籌備處。

胡楚生 1998〈楊家駱教授對於「四庫學」的貢獻〉，收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

崔富章 1990《四庫提要補正》，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張升 2012《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陳曉華 2008《「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曾守正 2011〈所見與不見——《四庫全書總目》視野下的《漁洋詩話》〉，收入

賴貴三主編：《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秩嵩壽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曾守正 2008《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黃愛平 2001《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

楊武泉 2001《四庫全書總目辨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趙園 2006《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魏小虎 2012《四庫全書總目匯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期刊論文

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清史研究》第3期，2000年8月。

汪受寬、劉鳳強〈《四庫全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2005年3月。

陳東輝〈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

崔富章〈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36卷第1期，2002年06月。

夏長樸〈《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初探——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漢學研究》第30卷第2期，2012年6月。

楊晉龍〈王士禎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地位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7期，1993年5月。

3. 外文部分

(日) 近藤光男 198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唐詩集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

(日) 笈文生、野村鮎子 2000《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日) 笈文生、野村鮎子 2006《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日) 笈文生、野村鮎子 2013《四庫提要宋代總集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One Drop Becomes a River: Siku Zongmu and Siku Quanshu Primary Imperial Presentation Catalog

Tseng, Shou-Ch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Ever since Qing Dynasty officials compiled the Siku Quanshu, the Siku Quanshu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discussion among intellectuals. In recent years, related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Wenyan ge Siku Quanshu, the Wenjing ge Siku Quanshu, the Siku Abstract Compilation Division Manuscript, the Siku Quanshu Primary Presentation Catalog, the Siku Zongmu, etc., have been one after the other reissued and reprinted, and so in modern academics, Siku Quanshu studies have already passed the period of being an undercurrent study, and have gradually come together as an important trend in research.

While the Siku Library was compiling all of the resources, the Siku Zongm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nd this book has had a really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the studies of cataloging history, and the stud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n regards to academic history, the Siku Zongmu book has been described by scholars as “since the Bie Lu, we started to have this book,” it was also seen as “the book that makes the people a fool,” which is quite controversial. The process of

publishing this book was very difficult, and it took them 20 years from the time they started and opened the Siku Library to the time they finished the Siku Zongmu. By comparing the Zongmu with other Abstracts, we can observe and study the process of condensation in the Zongmu, and it will also reveal the meaning of the officials'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will compare the two Qing Dynasty works, the Siku Quanshu Primary Imperial Presentation Catalog and the Siku Zongmu, and has discovered the same four following occurrences appear in both books, they are Weixi's weakened position, Wangshi zhen's deepening effects, the power of criticizing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recognition towards Southern Dynasty literature.

Keywords: Siku Studies, Siku Quanshu Primary Imperial Presentation Catalog, Siku Zongmu